

第三章 馬可仕時期軍人勢力的擴張

第一節 馬可仕統治下軍人勢力的崛起

1960年代末，菲律賓無論在政治、經濟與社會各方面都出現了混亂，各種反政府團體一一群起，如「新人民軍」、「摩洛民族解放陣線」、學生運動等都對政府造成不小的衝擊。由於菲國遭受左右兩派團體的夾攻，再加上回教叛軍在菲南的活動，已使菲國社會瀕臨瓦解的地步，因此馬可仕總統在權衡政治情勢後，於1972年9月12日宣布《戒嚴令》，以挽救國家危機，並且從事改革。馬可仕認為此時的菲國遭遇到七方面的威脅：共產黨革命、右派份子、回教分離主義者、私人軍隊、政治寡頭、犯罪份子和外國干涉等。¹為解決這些危機，必須更改體制，限制人身保護令的頒發，並將全國置於戒嚴法之下，權力集中於總統一人身上，到此階段，菲律賓可說是真正從民主政治走向了憲政獨裁。隨著戒嚴的施行，馬可仕終止了民主的體制與運作程序，憲法被廢止、立法機構被關閉、政黨被禁止活動、選舉被迫延期，公民與傳播媒體的自由也被多樣地設限。傳統的政治與經濟菁英在戒嚴法下，失去了政治勢力。²在馬可仕掌權的二十年中，他之所以能成功地掌控菲律賓的政治、社會等各方面，主要是依靠四種方式：一、立法控制；二、行政獨裁；三、朋黨掌控經濟體系及四、美國的保護。³他高超的政治謀略，利用軍隊的支持與協助，鞏固其政權。

馬可仕宣佈戒嚴的目的，從表面上來看是為了解決政權體制的問題以及國

1 陳鴻瑜，*菲律賓史-東西文明交會的島國*，三民，台北，2003年，頁116。

除了這些因素外，陳烈甫教授則認為亦有其他若干的因素，促成菲律賓的軍事統治：1.青年學生的示威暴動，以越來越嚴重。其背後有左派份子在操縱，至為明顯。2.犯罪浪潮猖獗，治安情形甚劣，尤以首都首善之區為甚。民間散槍多，多到數倍於國防部的槍械，衝突流血，司空見慣，每逢選舉之年，衝突流血更多。普通司法常軌，不能有力地應付這種局面，至為明顯。3.言論自由，容許反對意見的發表，固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但若濫用言論自由，攻擊詆毀，毫無限制，不但增加政治的混亂，且使人民，尤其智識份子，對政府完全失去信仰。濫用言論自由的弊害，必須予以終止。4.獨立以來，政壇風氣，每況愈下，貪污官吏者多，廉明者少。欲澄清政風，必須有賴大刀闊斧的作風，劍及履及的辦法。5.近年來青年受西方嘻皮風氣的影響，風氣敗壞，為了國家未來著想，有需採取斷然的手段。詳見 陳烈甫，「菲律賓與美國的特殊關係」，菲律賓對外關係，正中書局，台北，1974年，頁56-57。

2 Jane Hutchison, "Class and state power in the Philippines," in Kevin Hewison, Richard Robison and Garry Rodan (eds.), *Southeast Asia in the 1990s: Authoritarianism,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Australia: Allen & Unwin Pty Ltd, 1993, p. 196.

3 顧長永，*東南亞政府與政治*，五南，台北，2000年，頁204。

家發展的危機，不過從這也發現了菲律賓民主政治的脆弱，菲律賓在歷經了 72 年的(1900-1972)的民主化後，最後仍歸於失敗，其主要原因如下：

- 一、傳統政治文化與民主政治文化之間存在著差距；
- 二、獨立後，由地主寡頭構成的政黨和國會，其力量超過官僚體制，導致分贓的政黨政治以及行政自主性和效率的低落；
- 三、一般而言，實施民主的制度有三，即教育程度高、新興中產階級的興起和小家庭的出現。就菲社會來觀察，除了教育程度高一項外，餘兩個要件皆未具備，菲社會仍然存在著大家庭制和懸殊的貧富階級，中產階級未能從寡頭控制的工商企業、政黨和官僚體制中取得中流砥柱的地位，因此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傳統社會結構很難使民主體制植根。⁴

在戒嚴法的統治下，馬可仕獲得了立法權，可依命令治國，無須國會的同意立法，這時的菲國成了一人獨裁的局面。根據菲律賓大學赫南德茲(Carolina G. Hernandez)教授的觀察，菲國在長期戒嚴後，特別是在艾奎諾事件發生後，面臨了許多項的政治危機：

- 一、政治權力集中於一人之手；
- 二、缺乏制度化的機構向人民負責；
- 三、長久以來，傾向忽視人民應享的權利，尤其是人民應有的政治參與權力；
- 四、缺乏負責政治繼承的機能(mechanism)；
- 五、除了馬可仕以外，缺乏節制軍人的能力；
- 六、軍人興起，成為主要的政治勢力；
- 七、菲律賓社會的兩極化。⁵

除了赫南德茲外，凱斯勒(Richard J. Kessler)也針對戒嚴法對菲律賓所帶來的影響，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 一、強化國家軍力；

⁴ 陳鴻瑜，菲律賓的政治發展，商務，台北，1980年，頁322。

⁵ 轉摘自 盧克強，馬可仕統治下的菲律賓政治危機，政治大學三民所，1986年，頁141。

- 二、將軍隊的意識形態傳播至民間；
- 三、加強軍隊對平民大眾在生活上的控制；
- 四、對憲法做一轉變，允許軍隊增加對全國各方面的控制；
- 五、國內安全武力的軍事化。⁶

處在戒嚴社會中的菲國，其政治的發展卻也在不斷的衰退著，其中一個最顯著的面向，便是如上所說的軍人勢力的崛起與強化，雖然不是成為一國的主宰者，但在當時馬可仕的刻意安排下，讓軍隊的角色與任務一直不斷地擴張，這軍方角色的擴大對軍文關係的影響，即是讓軍隊變成政府在治理社會上的一個伙伴。⁷在此一時期，軍方勢力的上升造成文人統治力的下降，軍隊成為總統之下的工具，政府各部門都有軍人的影子，在戒嚴法下，菲國國內的政黨活動一律被禁止，國會被迫休會，許多反對黨政治領袖亦被關進監獄，只剩下總統與軍隊能行使權力，這其實或多或少都造成了文官政治機構的衰落，而這些機制也只能依附在馬可仕之下，反讓馬可仕變成這些文官機構的實際運作者。⁸同時，在馬可仕的運用下，菲律賓軍隊也從事有關於扣留或暗殺馬可仕政敵的作為，甚至操縱國內選舉的結果。至於屬於地方層次的人民家鄉自衛隊(Civilian Home Defense Force, CHDF)原本是用來對付地方叛亂組織或捕拿政治異議份子，卻往往成為由地方仕紳所控制的準私人軍隊。⁹這批人數眾多、紀律不整的家鄉自衛隊在地方作威作福，軍隊從中累積私人利益，到了艾奎諾夫人上台後，對此惡端深感痛惡，下令解散，另改組民兵部隊，不過這卻也種下之後軍隊發動軍事政變的因子。

以往的非國軍隊多扮演著較為低調、從屬於文人政府之下的角色，但在馬可仕與戒嚴法的施行下，搖身一變成了僅次於總統的重要角色，軍人勢力的崛起是

⁶ Richard J. Kessler, "Development and the Military: Role of the Philippine Military in Development," in J. Soedjati Djwandono, Yong Mun Cheong (eds.), *Soldiers and Stability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Regional Strategic Studies Programm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8, p. 217.

⁷ Carolina G. Hernandez, "The Philippines," in Zakaria Hajiahmad and Harold Crouch (eds.), *Military-Civilian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89-190.

⁸ Carolina G. Hernandez, "The Philippine military and civilian control: under Marcos and beyond," *The Third Quartely*, Vol.7, No.4, October, 1985, p. 912.

⁹ 哈諾德 克勞奇(Harnold Crouch) 著，楊鈞池 譯，「東南亞國家之政軍關係與第三波民主化政體的鞏固」，鞏固第三波民主，業強，台北，1997年，頁343。

個不爭的事實，其角色的擴張與轉變，可由以下幾個方面來看：¹⁰

一、維持國內安全及秩序的角色

軍隊在維護安全、法律與秩序上的角色，除了包括國防外，還包括了鎮壓暴動、叛亂、非法的暴力行為，並履行三軍統帥-總統所發佈的所有法律、命令、訓令及規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二號總令(General Order No.2)，內容牽涉到以顛覆、叛亂的罪名來將反對派領袖予以逮捕與拘禁，其餘的尚包括到 1978 年才禁止的全國性夜間燈火管制和宵禁的勤務，以及搜集民間無執照的武器，禁止勞工大會與政治集會的召開，鎮壓罷工與示威，甚至以妨礙國家安全為由搜捕私人擁有的水上交通工具。¹¹

為了確實加強戒嚴的施行，1975 年全國各地的警力首先被合併成國家警備部隊(Integrate National Police, INP)，並將其置於保安首長(Constabulary chief)的直接指揮之下。而後在 1983 年時，更把國家警備部隊歸併到陸軍部隊。諸如此類的更易，最終目的乃是要削除地方警備(軍事)的力量，方便總統一手包攬這種逐步將警察權集中於中央的手法，即是透過軍方為中介。另外，在區域統一指揮(Regional Unified Commands, RUCs)組織的成立上更直接提升了軍方對各地地方官員的控制力。由於軍方必須深度介入社會經濟事務，區域統一指揮部的指揮官擁有所轄地區事務的最終裁決權，這權力被認為原是屬於文治政府和議會的職權，一直到 1984 年才被廢止。另一方面，軍方維繫安全的角色更擴張至情報系統。根據總統安全指揮(Presidential Security Command)中原初的設計，軍方只有在大馬尼拉區因負有保護總統及其家屬的責任，職責之需得進行情報安全的工作，然而根據報導，軍方的情報機構不管是戒嚴時，或是戒嚴後，不僅在菲國境內，甚至在菲國駐外的大使館和領事館皆大肆活動，這個機構全名為「國家情報安全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Security Authority)，是附屬在總統之下的一個組織，負責人即為參謀總長。

¹⁰ 盧克強，前引書，頁 142-148。

¹¹ Carolina G. Hernandez, "The Philippines," *op. cit.*, p. 185.

二、司法的角色

由軍隊充任司法的角色乃是透過八號總令(General Order No.8)界定的。八號總令授權予參謀總長設立軍事法庭(Military Tribunals)以審判軍方的違法案件和「其他」案件。由於「其他」這兩字牽涉過廣，故什麼是「其他」案件，攸關事大，隨後發佈的十二號總令中勉強解釋「其他」案件乃包括涉及間諜行為、劫機、貪污、吸食禁藥、暴力等範圍的案件。不過由於對顛覆的判斷太過自由心證，缺乏明確的定義，使得連一些批評政府的人士也被送交軍事法庭審判。

三、行政和管理的角色

自 1972 年後，許多退役的將領進入至政府部門或公營企業充任行政管理的工作。軍隊奉令控制全國各地的傳播通訊機構，而後，各通訊傳播機構內充斥著大量軍職人員。許多原本為民營的公用事業或與軍需有關的工業同樣也納入軍方的管理。許多在職或退休的將領因此成為部長之下各級的主管，例如回教事務部(Ministry of Muslim Affairs)，國民住宅局、郵政總局等主管，皆為軍方的人。而菲國駐「曼谷」、「北京」、「河內」、「漢城」、「仰光」、「德黑蘭」、「特拉維夫」的大使都是退休的將領。另外，菲政府也投資設立「菲律賓退伍軍人投資開發公司」(Philippine Veterans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藉以酬庸退伍軍人。¹²

四、國家發展的角色

很明顯的，從戒嚴一開始，馬可仕心目中擔當促進國家發展任務先驅的希望，完全置於軍隊的身上。馬可仕交給軍方有三方面的任務，除了協助達成國家發展外，尚希望他們能直接參與發展計畫，最終目標則為了創造一良好的發展文化。根據社經發展與家鄉防衛計畫，軍方蓋了數百所校舍，提供上百萬的醫療和牙科診治服務給民眾，並在鄉間從事電力、糧食生產和教育一般平民。

然而軍方對於參與國家發展，並非完全處於被動接受命令的狀態，因為菲國教育課程的設計極為重視社會科學的薰陶，即使軍事學校亦然，故菲國軍官在軍事學院就讀時，早已浸淫於諸端思想，從事社會經濟改革，國家發展的志向加上

¹² 陳鴻瑜，「菲律賓軍人與政治發展」，問題與研究，第 25 卷第 10 期，1986 年，頁 44。

對個人前途有所助益的誘因下，自然很樂意擔負發展的角色。

五、政治上的角色

赫南德茲(Carolina G. Hernandez)曾對軍人角色擴張的情形做過解析，她說：「在戒嚴法下，軍隊成為該體制下的主要支持者以及履行政府政策的伙伴。在實施戒嚴後，國會被迫解散、政黨被禁止、大眾媒體被操弄，公民自由權也被剝奪。一個沒有軍事黷武傳統與軍隊在傳統上保持低姿態的國家，軍人竟能搖身一變成為顯眼的人物，他們要執行安全、法律與秩序的角色以及新的司法角色，也要執行較重大的管理、行政和發展的角色，且亦有著新的政治角色。」在這新的政治角色上，她也對此做一詳細的說明：「也許軍人在 1972 年後最重要的政治角色，便是取代傳統的政客，而扮演起政治體制內政治恩惠分配者的角色。許多請願者感覺到政治權力的分配已經轉變，因此改變他們的活動對象，便是從傳統政客轉向跟軍官尋求分配恩惠。」¹³

戒嚴以前菲國流行的政治關係是一種主從關係，這種傳統性的政治聯結在戒嚴後已被更換，新興的軍人起而代之，成為僅次於馬可仕的二號恩主。一些敏感的地方政客或請願者轉而尋求地方上的軍人的援助，廣大的農村地區與中央之間的聯結，不再是國會議員，而是由軍人來擔當這個角色。而這軍隊對於地方上廣大的鄉民所能提供的恩惠，大致尚可分為兩點來看。第一點，由於對戒嚴法的恐懼感，使得這些鄉民覺得有必要尋求軍人的庇護，使其心理上可以除去隨時被任何罪名濫加速捕的陰影，更進一步還可套套交情，以求被拘禁的親戚早日脫困出獄。第二點，由於軍方主持預算龐大的社會經濟改革計畫，菲人盼藉此能找到就業的機會。在戒嚴後，只有菲國國防軍事預算持續成長，靠軍方吃飯更是菲人現實的著眼點，憑著這點，菲國軍方自然成了新的恩主。

到了七十年代末，軍隊對政治的介入越來越深。1974 年，馬可仕更指出，菲律賓軍事學院要「訓練戰士不僅有作戰藝術，也要有管理文人政府的能力。」

¹³ Felipe B. Miranda, "The Military," in R. J. May & Francisco Nemenzo (eds.), *The Philippines After Marcos*, Great Britain: Printed and bound, 1986, p. 93.

在政府文職機構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軍官。軍隊對國家行政管理的介入，一方面使軍隊控制了一些經濟部門，更重要的是，它擴大了軍隊在社會的影響，有助於軍隊建立自己的政治基礎。¹⁴

六、預算與兵員的增加

在戒嚴時期，菲國軍隊的角色其實也是伴隨著其規模與預算的增加而擴大，而以下就藉由表四及表五來看當時菲律賓軍隊在兵力與預算上的升降。

(表 3-1)

菲律賓的國家與國防預算(1970-1983)

年	國家預算 (百萬披索)	國防預算(百萬披索)	國防預算占國家預算的百分比
1970	3,196	367	11.5
1971	3,462	413	11.9
1972	4,574	608	13.3
1973	5,639	842	14.9
1974	8,606	1,392	16.2
1975	20,169	2,962	14.7
1976	22,399	2,918	13.0
1977	23,759	5,381	22.6
1978	28,681	5,845	20.4
1979	32,236	5,579	17.3
1980	37,894	5,864	15.9
1981	50,320	7,108	14.1
1982	57,092	8,312	14.6
1983	61,383	8,808	14.2

資料來源：Felipe B. Miranda, "The Military," in R. J. May & Francisco Nemenzo (eds.), *The Philippines After Marcos*, Great Britain: Printed and bound, 1986, p. 95.

¹⁴ 張錫鎮，東南亞政府與政治，五南，台北，1999年，頁188-189。

(表 3-2)

菲國武裝部隊：兵員數(1970-1983)

年	兵員數
1970	59,000
1971	58,000
1972	62,715
1973	73,500
1974	87,920
1975	90,804
1976	142,490
1977	146,527
1978	152,561
1979	146,068
1980	146,400
1981	149,256
1982	149,107
1983	154,773

資料來源：Felipe B. Miranda, “The Military,” in R. J. May & Francisco Nemenzo (eds.), *The Philippines After Marcos*, Great Britain: Printed and bound, 1986, p. 169.

從上面的說明，多少可以看出當時菲國軍方已成為菲國一股重要的勢力。軍人與馬可仕是立於一種共生關係，即當文人統治者之權力增加或擴張時，軍人亦同樣延伸其權力，軍人與政府成為政治伙伴關係，軍人所負的重要責任，超過了正常的軍人角色，因為軍人同時也承擔司法及政治的角色。¹⁵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軍方角色的擴大，並非始自於軍方手中，而是由文人政權(馬可仕總統)所賦予的，因為憲法規定有緊急權的行使，因此在緊急時期內，文人政府有能力可以指揮統馭軍隊去承擔各種職責。¹⁶

馬可仕利用軍隊鞏固了自己的政權，但他也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一個他所扶植出來的強大軍隊，對他來說，亦有可能會成為他最大的潛在敵人，因此他必須對軍隊做一制約，軍中的派系對立就成了馬可仕制衡軍隊力量

¹⁵ 陳鴻瑜 (1986)，前引文，頁 43。

¹⁶ Carolina G. Hernandez, “The Philippine military and civilian control: under Marcos and beyond,” *op. cit.*, p. 908.

擴張的一項利器。但一個腐化、成為政府管理伙伴而有違軍人專業主義且派系問題嚴重的軍隊，也是軍隊內部改革派者所欲掃除的弊病，這也造成日後軍中改革運動的興起，這個改革團體從最初的欲革新軍隊，到最後也成了一個反馬可仕最力的組織之一，因此下節將針對軍中派系及軍中改革運動做一介紹與討論。

第二節 軍中改革運動的出現

在談論到軍中改革運動的興起時，不得不先提到菲律賓軍隊內部的派系問題。在一個大團體裡，其內部成員皆來自不同的地域、學歷與身份背景，不過一些成員可能因其相同的背景而聚集在一起，而形成一股力量。同為大團體生活的菲律賓軍隊亦是如此，其中，地域主義便是討論到菲國軍隊派系話題時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這個地域主義是以居住地及語言團體為特點，如高階軍官大都來自與馬可仕同鄉的伊羅干洛斯族(Ilocanos)或來自與伊美黛同鄉的米賽亞族(Visayans)。此兩大語言團體分別散佈在菲律賓北部和中部地區，也是天主教徒住區，故很少有甄選自南部回民的軍官。即使政府為平息回民之不滿，在 1980 年代後期甄選回民入保安軍隊，但成效不佳，因為許多軍官認為南部回民知識程度低落，對回民持排斥態度。¹⁷因此，這樣的派系問題就會結合了地域主義，馬可仕在 1965 年上台後就迅速地促使菲國武裝部隊走向伊羅干洛斯省化。¹⁸當然，馬可仕這樣的舉動，也多少會讓部分非伊羅干洛斯省出身的低階軍官而感到忿忿不平，也種下軍中改革運動興起的遠因。

1983 年發生艾奎諾被暗殺事件後，菲國軍隊分裂成三派，一派是參謀總長維爾(Fabian Ver)；一派是國防部長安利爾(Juan Ponce Enrile)與副參謀總長兼保安軍司令羅慕斯；最後則是由少壯派所組成的軍中改革運動，而這少壯派的組織與活動，暗中則頗得當時國防部長的支持。就湯普森與菲爾(W. Scott Thompson & D. Phil)的觀察，之所以會有派系之爭的起因，可歸納為三點來看，一為當時馬可仕

¹⁷ 陳鴻瑜 (1986)，前引文，頁 45。

¹⁸ W. Scott Thompson & D. Phil, "Military Culture," *The Philippines in Crisis*, N.Y.: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2, p. 77.

的兩個表弟-維爾與羅慕斯為了影響力而彼此競爭；二為軍事階級(military class)的問題，這即牽涉到了正統軍事學院派與非軍事學院派的競爭與對立；最後則與菲國武裝部隊的規模擴大有關，¹⁹軍力與預算的擴張，加大了軍隊的影響力，也增加了軍官彼此競逐的可能。針對此，當時在 1989 年發生政變後而成立的內閣危機委員會成員索利安諾(Emmanuel Soriano)就曾指明，像兄弟會組織發展的軍隊派系，其規模的擴大是無可避免的趨勢，不過這會「弱化了原屬於群體生活並紀律嚴格的軍隊外貌」，在這樣的情況下，過去舊傳統的約束也將不再有效力。²⁰

從此時菲國出現的軍隊派系問題來看，我們發現了馬可仕絕妙的統治手段，他雖依靠軍隊來鞏固他的政權，但他仍很有心地想讓軍隊處於相互牽制的地位。畢竟一個強大的軍隊是個可以壓制政敵的平衡桿，但在藉由宣佈戒嚴消除了他的政敵之後，軍隊反而成了馬可仕政權最大的威脅者，因此，他採取了分裂與抑制的政策來對付軍隊，²¹即同時重用維爾與羅慕斯兩人，這無非就是要讓軍隊分成兩大陣營，使兩派相互牽制與制約，從而確保他自己的仲裁地位。但是馬可仕卻萬萬沒有想到，這派系對立與競逐的結果，卻是造成其日後政權垮台的遠因。

除了軍中派系的問題越演越烈之外，由於軍中出現貪污腐化、紀律不良、薪俸低微等現象，導致有許多少壯軍官關心軍人專業精神的式微，乃要求改革，恢復軍人的優良傳統與聲望。他們要求更換菲律賓武裝部隊的領導人，希望羅慕斯擔任參謀總長；其次，他們要求公正迅速的調查艾奎諾案，懲罰犯罪者，以重振軍紀。²²因為長期以來軍事制度的不健全，許多有理想的軍人也想積極參與改革，在戒嚴時期，馬可仕為鞏固其個人的威權統治，不惜破壞制度，濫用私人，許多專業軍人無法升遷，軍中乃產生一股不滿的情緒，開始秘密結社，²³在艾奎諾案發生後，軍中即有部分少壯派軍官開始醞釀洗刷軍人涉案的污名，至 1984

¹⁹ *Ibid.*, pp. 77-78.

²⁰ *Ibid.*, p. 78.

²¹ Richard J. Kessler, "Development and the Military: Role of the Philippine Military in Development," *op. cit.*, p. 222.

²² 陳鴻瑜 (1986)，前引文，頁 46。

²³ 洪松輝，「論菲律賓文武關係之演變」，東亞季刊，第 27 卷第 5 期，1996 年，頁 131。

年，該運動達到高潮。他們提出「我們有所屬」(We Belong)的口號，做為改革運動的座右銘。1985年3月21日，在菲律賓軍校的畢業典禮上，有一大群畢業生手拿旗幟進行安靜示威，要求改革菲律賓武裝部隊，至此才使軍中改革運動表面化。當時該運動的領袖表示，從1971年到今日發起運動的時刻，這批軍校生大多支持該運動，據估計在全菲1萬3000名軍官中，加入改革運動者有1500人，該運動之政治指令由11人所組成的指導委員會負責。多數參與軍官的年齡在20-30歲，充滿改革熱情，但欠缺政治經驗。²⁴

在1985年3月軍中改革運動發出了一份名為「共同期望的聲明」(Statement of Common Aspirations)，希望藉由改革重建武裝部隊的統一、尊嚴、名譽與紀律，而其表達的要點如下：

一、維持一強大且統一的武裝部隊，藉以鞏固人民及國家的主權；支持憲法與保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同時並粉碎國內外的分裂勢力；

二、去除菲國武裝部隊中的弊端；

三、維持高度的紀律；

四、有效執行公績制；

五、重新訂定菲國武裝部隊的訓練與教育方針；

六、提高軍中男女軍官的士氣與福利；

七、重建武裝部隊內部的同志愛與團隊精神；

八、合理地管理武裝部隊中有限的資源；

九、讓領導者的觀念與實踐都能符合基本憲法的概念與武裝部隊的任務。²⁵

在1985年4月，當時的國防部長安利爾和副參謀總長羅慕斯曾與軍中改革派代表舉行會議，同意他們所提出的改革建議，也鼓勵他們晉見馬可仕總統，5月31日總統與改革運動領袖舉行會談，惟似乎沒有接受他們的建議。²⁶軍中改

²⁴ 陳鴻瑜 (1986)，前引文，頁47。

²⁵ Carolina G. Hernandez, "The Philippine military and civilian control: under Marcos and beyond," *op. cit.*, p. 917.

²⁶ 陳鴻瑜 (1986)，前引文，頁47。

革運動的興起，內容多為要求重建軍隊的專業主義、改善軍中資源、提升士氣以及澄清吏治，少壯派軍官的立意是好的，但是這些行為皆已經逾越了專業軍人所應有的本分，從這也不難看出戒嚴對菲國軍隊的影響，軍隊政治化的情況已至為嚴重，而後更結合了人民力量的崛起，一同推翻了馬可仕王朝。

1986年2月7日，菲律賓舉行總統大選，軍中改革運動展開一項「1986年良心」(Kamalayan'86 或 Consciousness '86)運動，呼籲軍人勿干預選舉過程，鼓勵選民登記，勿出賣選票，並希望在軍中舉辦「祈禱者座談會」(prayer seminars)，邀請中央選舉署和「全國公民自由選舉活動」的官員演講有關進行乾淨選舉的要義。2月9日，有35名電腦計票人員因目睹政府人員在選票上作弊而由軍中改革運動的官員護送離開中央選舉署，並予以保護掩蔽。2月11日，維爾將軍與軍中改革運動的領袖舉行協調會，馬可仕下令要追捕這些逃走的電腦技術人員，但因反對勢力越來越大，迫使馬可仕在未採取逮捕行動前即將計票工作移交國民議會。至2月25日馬可仕及艾奎諾夫人分別宣誓就任總統時止，軍中改革派在中下級軍官中，約有70%左有的支持者，他們表示將支持依公正選舉而獲勝的一方。²⁷這軍中改革運動的成員，從當初要求內部改革到1986年2月的總統大選，隨著情勢的演變與人民力量的不斷上漲，以及最後國防部長安利爾與副參謀總長羅慕斯公開宣佈倒戈的情況下，這批軍官成了除菲律賓大眾及教會外反馬可仕最力的一個團體。雖然在大選之前，馬可仕和軍方都一再宣稱不會有軍人干政的情形出現，不過每個觀察家都懷疑這項說法，畢竟許多事實顯示出，要菲國軍人再退回軍營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此當時有觀察家認為，菲國軍方在戒嚴後即使是服膺文治原則，也只是服從馬可仕這位文人出身的總統，可惜這樣「軍隊中立」的表象，也在1986年「二月革命」中被打破。²⁸

從軍中改革運動的興起我們可以發現，此時的菲國軍隊，在其內部的資深與新進軍官間早已存在著一條觀念上的鴻溝。在一些資深或已退休的軍官觀念中，

²⁷ 陳鴻瑜 (1986)，前引文，頁 48。

²⁸ 盧克強，前引書，頁 150。

特別強調軍隊「協助性」的角色，要軍隊遠離政治舞台，因這些軍官(例如伊雷多 Iletto、維拉 de Villa、羅慕斯將軍)曾在 1940 及 1950 年代被派遣至美國的作戰參謀學校學習，接受文人至上的原則；反之現在這批年輕軍官則是在 1970 年代甚或是以後才進來服役的，他們接受菲律賓軍事學院所給予社會化的過程以及訓練，他們亦與 1960 年代復甦的激進學生運動的性質一樣，他們視軍隊介入政治事務中不僅是合乎體統的，在某些情況下更是必要的，因此，亦有學者將菲國武裝部隊在此時期的作為視為是走向「印尼化」的結果。²⁹不過，我們需要注意的是，RAM 雖打著反馬可仕的旗號，但軍隊並非是反馬可仕的人，而是反軍中貪污文化、升遷受阻等問題且欲提高軍中士氣而有的一項改革活動；儘管軍隊在「二月革命」中扮演推翻馬可仕擁立艾奎諾夫人的角色，但軍隊在此時期明顯地政治化以及馬可仕刻意將軍隊私人化只效忠於他的影響下，日後 RAM 軍官反與馬可仕支持者結合，策劃多起兵變撼動艾奎諾政府。另外，我們可以發現軍中改革運動的興起，背後也蘊含了幾點意義：

一、軍官自省能力加強，開始組團要求改革並為己謀福利，這樣的過程亦可謂是軍隊政治化的結果，然而觀察之後 RAM 對馬可仕以及艾奎諾政府的作為，可以發現 RAM 成了一股新起的「壓力團體」，政府的更替與政策的轉變，多少的受到其之影響，更有甚者，日後的 RAM 竟成了除了菲共「新人民軍」以及穆斯林分離主義份子之外，菲律賓的三大叛亂團體之一。

二、跟政治化概念相關的，軍方在此時所受的教育與任務的影響下，增加其政治意識形態的形成，不過更重要的是，軍隊「反政府」的傾向也開始茁壯，早期在賈西亞、馬加柏舉時代，為保有文人至上的優勢，削減軍隊預算及國家發展任務以減少軍隊影響力，軍隊雖有不滿但仍未有大規模抗議行動的發動與組織，然而，今日的軍中改革運動則是由軍隊內有志之士主動發起組團，本從當初的

²⁹ 根據穆戈(Benjamin N. Muego)的解釋，這「印尼化」的意思即是指軍隊企圖想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尤其是在面臨文人政府崩潰或即將崩潰之時。詳見 Benjamin N. Muego, "Civilian Rule in the Philippines," in Constantine P. Danopoulos (eds.), *Civilian Rul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Democracy on the March*, USA: Westview Press, Inc., 1992, pp. 218-219.

要求軍隊內部改革，漸漸走向反政府運動。

馬可仕依靠軍隊，卻不希望軍隊太過強大反過來威脅他，因此用巧妙的手段分裂軍隊，以達到制衡與仲裁的目的，不過會發生「二月革命」，除了馬可仕喪失了軍心與民心外，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看出，馬可仕在駕馭軍隊方面，雖成功地分化了軍隊，但卻因利益分配不均，馬可仕過於寵信維爾，導致維爾派與安利爾派的鬥爭浮上台面，讓原本有心想角逐總統寶座的安利爾陣前倒戈，反支持反對派的艾奎諾夫人為菲律賓新一任的總統。這似乎也印證了范納(S. E. Finer)的觀點，軍官個人可能由於對物質利益的要求與對升遷的渴望，往往都會是促使軍官個人參與政變的動機。³⁰安利爾雖是馬可仕的親密戰友，但因為馬可仕的分贓不均及前者欲角逐總統寶位受阻，導致了安利爾的不滿，再加上當時人民群起反抗馬可仕王朝的情勢激化下，反讓安利爾掌控住了政變的動機與時機，而倒戈支持艾奎諾夫人入主馬拉坎南宮，成功推翻馬可仕政權。不過，擁立新主有功的安利爾卻在艾奎諾夫人上任後幾度與總統發生爭執而求去，回歸軍營後的菲國武裝部隊也並未因新政權的來臨而恢復本分，反而在艾奎諾夫人任內發動了七次不成功的政變，當時馬尼拉駐莫斯科的大使梅爾契(Melchor)曾向外交部發表一篇報告，認為「現今菲律賓不穩定的最主要原因便是菲國武裝部隊的問題」，因此建議政府應對軍隊在「結構上做一深層的改革」。³¹深受專業主義規範的菲國軍隊，在歷經馬可仕的統治後，其政治化程度日漸加深，這也造成日後在艾奎諾夫人任內多次的兵變，關於艾奎諾夫人與軍隊的問題，將在下一章做介紹，本章就不多做贅述。話說回來，馬可仕任內的文武關係是呈現了一個什麼樣的發展？而此時的軍隊又呈現出什麼樣的特質？這些皆是筆者在下一節所欲探討的內容。

第三節 文武關係的演變

歷史的記載生動地描述了菲律賓軍隊近 50 年來所歷經的一些階段。從 1935

³⁰ S. E. Finer, *The Man on the Horse 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N.Y.: Frederick A. Praeger, 1962, pp. 35-56.

³¹ W. Scott Thompson & D. Phil, *op. cit.*, pp. 82-83.

年軍隊的創建到 1950 年代左右，軍隊從政治的影響中脫離；而從 1950 年到 1965 年間，軍隊活躍地介入社會經濟與政治中(例如在大選期間維持和平與秩序)；從 1966 年到戒嚴宣布，軍隊的重要性竟戲劇性的大幅增加，但當時軍隊的角色仍限制在社會經濟及少部分的政治任務上；隨著戒嚴的實施，軍隊介入的程度已在性質上呈現出了差異，這表示軍隊在政治功能上的積極參與，這時也證明了在馬可仕時代，軍隊就扮演了如同是政府的次級伙伴的這樣一個新角色。³²

在馬可仕威權獨裁的統治下，早期文武關係的發展，可謂是文人與軍人彼此共生期，軍文雙方會有如此親密的共生關係出現，亦和當時的環境背景有關，該時期的菲律賓在政治上實行威權統治，政黨停止活動，以及為鎮壓日漸擴大的叛亂活動，使軍人成為社會最具勢力的團體，再加上官僚結構中主從關係盛行，還有在國際上美國支持威權主義政府，遂引導軍人進入政治，成為禁衛軍；至馬可仕後期，由於領導者控制軍隊失效，再加上美國改為反對威權主義提倡民主的政策，以及天主教對威權政府的批判，遂使馬可仕政府崩解，且依上述導致軍人介入政治的條件，使得軍隊喪失專業軍人的特質，甚而發動軍事政變。³³

由此可知，馬可仕時期菲律賓的文武關係，可分成兩個時期來看，在 1972 年戒嚴以前，儘管軍隊的職能已擴大到社會經濟範圍，然而這時軍隊還未滲透到政治中，還沒有對政府決策產生影響；1972 年《戒嚴法》的頒佈以及後來長達近十年的戒嚴法統治，使菲律賓軍隊的地位發生很大變化。馬可仕在頒佈戒嚴法的同時，宣布軍隊「要維護整個菲律賓的法律和秩序，防止和鎮壓各種非法暴力以及各種反叛、暴亂行為，迫使人們服從我頒佈的或根據我的指示所頒佈的法律、法令、命令和條例。」這樣，軍隊的權力就擴大到搜繳民間武器、鎮壓集會遊行示威等政治領域。戒嚴法的實施，不僅鞏固了馬可仕的權位，也增強了軍隊的政治力，讓馬可仕與軍隊間的互賴與利益共同體的關係變得更為牢固緊密。實

³² Felipe B. Miranda & Ruben F. Ciron, "Development and Military in the Philippines: Military Perceptions in a Time of Continuing Crisis," in J. Soedjati Djwandono and Yong Mun Cheong (eds.), *Soldiers and Stability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Regional Strategic Studies Programm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8, p. 177.

³³ 謝光中，菲律賓文武關係的回顧與展望，政治作戰學校政研所，1998 年，頁 62。

際上，除了軍隊之外，美國政府的協助也成了戒嚴時期，馬可仕政權能鞏固的原因之一，在馬可仕宣佈戒嚴後，對美國的倚靠就越來越多；而美國也認為馬可仕有能力維護菲律賓的民主政體以符合美國的利益。而 1970 年代也正是菲共「新人民軍」(New People's Army)迅速發展的時期，這造成菲律賓社會的相當不穩定，因此美國的軍援經援就更具有意義。就軍事面來說，美國不僅提供軍事裝備給菲律賓武裝部隊，也訓練菲律賓武裝部隊以對抗菲共「新人民軍」的武裝叛亂，由於有美軍的駐防，菲律賓的軍隊在 1980 年代時相當弱，不僅裝備不夠（無高科技的雷達），人員的素質也相當低弱。³⁴然而這等於是刺激了日後軍中改革運動興起的原因之一，以及 1980 年代群眾反美意識的高漲。

在馬可仕時代由於菲律賓社會對軍人角色認知的扭曲，這實際上忽略了軍人當初真正的角色，反而合理化了這個時期軍人所擁有的「新角色」。與此同時的，在軍隊中，來自總統家鄉的人員的勢力在不斷的增大，軍隊任務的分配與升遷的標準也不再是以能力、資深的程度來判定，而是取決於私人關係、個人的忠誠度以及家族的關係。³⁵軍隊在戒嚴時期的所作所為，讓菲律賓大眾失去了對軍隊僅剩的一絲尊敬，軍民關係也降至冰點。

不過，馬可仕總統施行戒嚴的經驗，的確改變了菲律賓軍隊的文化特質。特別是對年輕軍官來說，正如拉丁美洲國家強調的「新專業主義」(new professionalism)一樣，由於主張以政治、社會與經濟，甚至於軍事的專業手段來鎮壓國內叛變組織的觀念與作法，致使許多年輕軍官不再願意盲目地效忠文人政府，甚至許多年輕軍官在 80 年代晚期還企圖發動對總統艾奎諾夫人的軍事叛變行為。³⁶

馬可仕的強人專制統治終於在 1981 年解除了戒嚴，但菲律賓卻未因此而獲得真正的民主與自由，因為，一個新的憲政獨裁體制被建立了起來，傳統舊的制

³⁴ 顧長永，前引書，頁 223-224。

³⁵ Carl H. Lande, "The Political crisis," in John Bresnan (eds.), *Crisis in the Philippines-The Marcos Era and Beyond*,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37.

³⁶ 哈諾德 克勞奇(Harnold Crouch) 著，楊鈞池 譯，前引書，頁 340。

衡體制在此已蕩然無存，總統權力在這新的體制之下變得更加擴大，諷刺的是，這個時期有時反會被稱為是「沒有戒嚴的戒嚴」。³⁷與此同時，馬可仕總統的策略在 1980 年代出也開始受到挑戰，其中一部份是來自於菲律賓人民的民族主義興起，馬可仕雖在 1981 年廢止戒嚴令，並進行總統的選舉，可是菲律賓人卻發現馬可仕總統仍然在實施憲政獨裁，遂開始對馬可仕政權進行批判。反對勢力在 1980 年代越來越壯大，除了左派的菲共「新人民軍」以外，南部尚有回教的叛亂團體(如「摩洛民族解放陣線」)，在菲國天主教信徒中，自由派人士的反對勢力更是受到重視。前兩派的反對勢力是進行體制外的革命，而第三派是以體制內的改革為主，其中後者的勢力最龐大，菲國自由派人士的反對勢力在 1983 年 8 月 21 日當前參議員艾奎諾自美國返回菲律賓，在馬尼拉機場公然受到殺害後，達到了高潮，而這也讓菲律賓的反對勢力因此大團結，這次他們不僅將矛頭指向馬可仕總統，更指向支持其政權的美國。³⁸美國在菲國政局的衝擊之下，雷根政府也開始向馬可仕施壓，要其在國內推行民主政治，到了 1986 年 2 月革命時，美國政府還成為要求馬可仕下台的外力之一。在馬可仕任內，他最倚仗的兩大力量便是美國華府與菲國軍隊對其政權的支持，不過政治現實的詭譎多變與在利益的前提下，馬可仕反而痛失「戰友」最重要的協助。

另外一方面，馬可仕與軍隊間良好的互賴關係在 1980 年代也遇到了瓶頸，而這些因素的出現造成了兩造間文武關係轉變並讓軍隊走向反政府的道路：

一、軍中派系問題的越演越烈：馬可仕雖成功地利用派系的問題來達到各派軍隊勢力間的相互鬥爭與牽制，好讓他可以從中取得仲裁權與操控權，再加上他刻意提拔維爾將軍的情況下，導致其他派系將領如安利爾的不滿，甚而在之後密謀欲發動政變推翻馬可仕，只是消息被洩漏，讓馬可仕有了警惕而不得不作罷，但這也促使日後「二月革命」發生時，軍方加入人民力量，一同反對馬可仕政權。

二、1983 年參議員艾奎諾被暗殺一案的影響：當時菲國傳聞該案件是由馬

³⁷ Harold Crouch, *The Continuing Crisis in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ISIS Seminar Paper,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IS), 1985, p. 3.

³⁸ 顧長永，前引書，頁 225。

可仕總統的授意且有不少軍官包括維爾將軍亦涉入其中，全國譁然，因此在該案發生不久後，軍中就有部分少壯派的軍官開始從事洗刷軍人涉案的污名並要求改革武裝部隊，這造成軍中改革運動的浮上台面。

三、中低階軍官升遷管道受阻：馬可仕以忠誠、裙帶關係作為用人的根據，再加上一些本該退休但與馬可仕關係良好的資深軍官卻一直留任，進而阻斷其他軍官晉升的可能，以及中低階軍官間的薪水福利甚為低微的情況下，引起多數中低階軍官的不滿，呼籲政府改革。

從這我們可以看出，馬可仕時代文武關係的分水嶺可由艾奎諾暗殺事件為界，從馬可仕上任到戒嚴宣布與實行，軍方一躍成為政府的管理伙伴，也是馬可仕政權的擁護者，戒嚴時代是軍文雙方的蜜月期以及勢力大幅上揚的時期，即使戒嚴解除後，軍方勢力大減，馬可仕依舊能有效控制軍隊；艾奎諾被暗殺案的發生，部分軍官被牽連進去，導致了這良好關係走向破局，軍中機制在馬可仕長期的操縱下已趨於衰敗，部分少壯派軍官早已不滿並已有欲改革的浪潮，該事件的發生，反而激化了軍中改革運動的誕生，最後該團體更走向反馬可仕之路。

但亦不可否認的，馬可仕以一個文人政府，卻能牢牢控制和駕馭軍隊，這的確是他厲害之處，他之所以能成功掌控軍隊，無非也是和兩點原因有關，首先、馬可仕透過培植親信，緊緊地把軍權抓在自己的手裡。軍管以後，他對軍隊的高層進行大幅改組，只要對馬可仕的忠誠表現出動搖就遭撤換或調離；其次，馬可仕利用軍隊內部的派系鬥爭和相互制約，使其成為派系衝突中的仲裁者，從而確保其領導地位。³⁹但是他這高超的手腕與策略，卻成為日後其政權的負累，軍隊漸生不滿，軍中改革運動的興起，亦可以說是對馬可仕該項策略的反動。

從上文來看，如果要討論馬可仕時代的軍隊何以為從政府伙伴的角色轉而成為反政府的角色，這軍隊「政治意識」的發展，可以作為有力的解釋，軍隊高度政治化的影響下，讓軍隊有支持政府或反對政府的意念，而派系鬥爭與軍中改革運動的興起則成了軍隊反政府的催化劑，馬可仕當初雖有效地掌控軍隊，但他卻

³⁹ 謝光中，前引書，頁 88。

忽略了軍隊已帶有「政治化」的傾向，這也造成其政權的垮台。

我們可以發現馬可仕時期的軍隊，已有別於建國獨立時期的軍隊，在角色與權力上有著顯著的轉變與擴張，而軍隊亦呈現出三種特色：

一、成為政府管理上的伙伴、政權的支持者；

二、新的恩庇伺從主義的開始，軍人取代政府及地方官員，成為新的政治恩惠分配者；

三、派系問題嚴重、競爭激烈。

軍隊會發展出這三項特徵，跟軍隊走向政治化、馬可仕的操弄以及當時的環境背景影響下都有著很大的關連，其中，馬可仕則是讓軍隊介入政治最重要的中介變數，不過很諷刺的，這批原本是政權鞏固者、政府伙伴的軍隊，卻在馬可仕統治的末期成了推翻其政權的叛軍，馬可仕雖在統治初期與中期能有效掌控軍隊，但他忽略了大環境下的變化，再加上以忠誠作為軍隊晉升的考量制度以及軍隊派系與接班的問題越演越烈下，讓原本聽命於他的軍隊也不得不為自身利益（這通常也結合了軍人所認為的國家利益）而起身推翻馬可仕政權。因此馬可仕王朝的興亡，可以說是，成也軍隊，敗也軍隊。